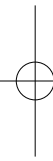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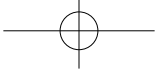


前言

我是一九六三年進入中文大學，在新亞書院上中文系，那年我剛好十七歲，新亞還在農圃道。十七歲的小伙子好奇心特重，對什麼都感到興趣，所以我什麼樣的課都想去修讀或旁聽。中文、英文、哲學、歷史、藝術系的課都上過一些。那個年頭，新亞是名師如雲，除了校長錢穆先生以外，還有中文系的潘重規先生、哲學系的唐君毅先生、英文系的張葆恆先生、藝術系的王季遷先生、歷史系的牟潤孫先生。我雜七雜八的上課，半懂半不懂，但總算是初入堂廡，眼界漸開。我們中文系那年一年級只有二十一個同學，大家一起上課、吃飯、參加不同的活動，一邊讀書，一邊玩樂，快活不知時日。

錢先生是一九六五年離開新亞。那時我已經是大二的學生。在那兩年中，我沒有上過錢先生的課，但是錢先生的講演，我們都盡可能去聽。錢先生口音很重，我雖然會說上海話，但是兩年下來，還只能聽個大概。錢先生很喜歡下午時分，在新亞長廊上



來回踱方步。他個子不大，但是在夕陽斜照底下，他背後的身影很長。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小青年，從教室的窗戶，或是在籃球場的欄杆旁邊，望著錢先生的身影，一代宗師的風範，我們都有時候看呆了。也許是太年輕了，心態懵懂，只知道景仰，而不知道景仰背後該做些什麼。我們的系主任潘重規先生，師從黃侃先生，學問淵博。有一天，他在飯後和我們閒聊，說起他自己讀書的艱辛。三千年的經典，他在故紙堆中，埋頭苦讀二十年，這才稍稍明白別人提出任何一個小問題，背後其實都牽涉到一些更大的問題，自己這也才敢略略表示自己的看法。學海無涯，他語重心長地說，要是同學還不到二十歲的也許可以再玩一些日子，要是已經過了二十歲才開始認真唸書，那就為時已晚。當頭棒喝，我們這才漸漸收拾起玩耍的心，打開書本，好好地跟老師學習。

二零零四年，我回到中文系工作。馬料水的中大跟我從前在農圃道上學的新亞書院不很一樣，原先不很習慣。幾年下來，漸漸熟悉學校的新制度，對新環境也漸漸產生感情，和老師共事，和同學共同學習。是機緣巧合，讓我有這個機會重新投入中大，在中文系任職，參與各種教研和文娛活動，從真實經驗中體會到什麼是我們新亞「結隊向前行」的精神。我們中文系五十年前的名師宿儒雖然不再，但是新一輩的老師，人才濟濟，各有自己的研究專長和視野，我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前後六年，同學對我的

影響也很大。年輕人的朝氣活力，勇於嘗試、勇於拓新，正是我們做學問最大的原動力。二零一零年，我退休後重返美國故居。

我這次承新亞書院的邀請，三月間前來參加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發表論文，實在感到慚愧和惶恐。錢先生是國學大師，他的學問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當年南來，艱險奮進之際，創辦新亞書院，繼承我中華人文精神。這種對學問和正義的執著、為繼往開來所作的努力，是錢先生給後學樹立的典範精神。我回首過去，無論在教學或研究方面，自己都是乏善足陳。兩年前，信廣來教授和黃乃正教授兩位前後院長力邀來訪，我的反應是這絕對不可能。我只是一個對語言稍有研究的人，蚍蜉漏見，所知實在有限。怎敢承擔這如此重要的任務？我們談了很久，兩位院長盛意拳拳，我感到卻之不恭。我翻看這許多年來擔任講座的先生都是博學鴻儒，大塊文章，發人深省。我如果是能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一些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也許可以提供給各位老師同學參考。考慮再三，我終於不揣其漏，大膽地把擔子接過來。學問之路艱險奮進，原無止境。我的看法就是有粗疏不成熟之處，相信諸位先生一定有以諒我。

我從上研究院開始，研究重點一直是放在語言學上。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對文史哲各個領域的興趣從來沒有丟下。這也許是

因為文史哲的研究都離不開語言文字。倉頡造字，開啟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文字本諸語言，但口語相傳還往往有賴文字記錄。所謂文以載道，「文」可以理解為表達「道」的形象工具。道可道非常道，道和文之間所表達的雖有偏差，但是道德五千言，還是離不開語言文字。玄奘西域取經，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五四倡白話代替文言，哪一種人文工作不是從語言開始？我以前在美國教書的時候，我們的系叫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有人問為什麼不叫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又或者叫 East Asian Civilization？我們都知道 Oriental 一詞在七八十年代受東方主義研究興起的影響而被淘汰。至於 language 一詞的概括面是否全面恰當？當時系裡年長的同事說，所有的文化文史研究，都是以語言為根本。所以用 language 一個字，就可以照顧到整個文化大範疇。我們系本身就兼顧語言、文學兩大範疇，同時也要求外系老師參與教學，從理論討論到材料掌握，進行跨系、跨範疇的研究，拓寬各人自己的視野和識見。

語言學涉獵面其實很廣，舉凡任何和語言甚至文字有關的現象，都值得深入探討和分析。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漢語，對歷時和共時變化的觀察、對方言之間的異同、對漢語教學所面對的各種課題，我或多或少都做過一些研究，發表過一些文章。不過這許多年來，我的興趣一直集中在粵語。我在中大上研究院的時候，

老師是周法高先生，他讓我寫粵語語法，這就決定我接著幾十年的研究路子。我來美國唸書，老師是張琨先生，他讓我寫敦煌語法，啟發我從歷史角度切入，探討歷時語法變化的軌跡。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我開始搜集有關十九世紀粵語的老材料，研究早期粵語。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得到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讓我能集中精神在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建立資料庫。我前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早期粵語的文章，特別是擬構粵語在這快兩百年間的語音和語法遞變規律。這次講座，就把一部分的研究分成兩講，藉以描述早期粵語中一些特殊現象。第一講是有關粵語語法，利用早期傳教士等編寫的粵語口語教材，摘取其中一些特別用例，究其所以，進行一種比較有系統的語法分析。第二講的重點是粵音，所用的材料是一份1866年編製的中英雙語地圖，把其中有關香港、九龍和新界一帶的地名，歸攏在一起，考察當時地名注音所代表的到底是什麼語言？是早期粵語，還是別地方言？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對比十九世紀的讀音和今日二十一世紀粵語的發音，從同異中找尋這一百多年語音演變的痕跡。兩講所據原有文章都在文中一一列明。

至於第三講，我選了一個文學的題目，討論魯迅的小說。我不是研究文學的人，但對文學、特別是小說別有偏愛。我曾經教過古典和現代小說，也寫過一些有關文章；但因為不是科班出

身，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訓練，討論未免有嫌是野狐禪。我研究語言，因為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張口吐舌，發放聲音，每個聲音、每個詞語、每個句子，都是按著一定的規律組合，表達自己心中想表達的意思。要是在聲音高低、用詞造句方面，略有挪動，那麼表達的意思或語氣也就有所不同。要是我能從語言表面呈現的現象而理出語言背後的規律和變化，那麼我想研究文學也應該可以循著同樣路子，解構文本。文學創作，嘔心瀝血。一字一句背後又何嘗不能說明作者寫作時的用心良苦？我就是想從小說的文字中找出文字背後所蘊藏的涵義。我這次討論的是魯迅名作《祝福》。野人獻曝，我講演的時候，在座許多都是研究文學的專家學者，我戰戰兢兢之餘，最後用了「魯班門前說魯迅」一句作為結語，就是為了向聽眾表示我由衷感到的不足。

這次講演的稿子，承中文大學出版社不棄，輯成小書。書名就以《一切從語言開始》為題。文章按講演形式發表，以口語為主，文字略作潤飾。文中不詳列腳註或引用書目，但是在討論中有必須交代的地方，就另作說明。三講部分內容曾在不同學術會議上發表，有關粵語的兩講則根據已發表多篇文章修改成稿，討論部分較簡略，詳細內容請參看原文。書前附有鄧思穎教授為講演撰寫的講著簡介，謬譽有加，實在愧不敢當。

我研究粵語的計劃，前後得到片岡新、郭必之和姚玉敏三位先生多年的鼓勵和協助，在香港講演的那三天，在場聽眾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供我參考，銘感之心，非語言所能形容。新亞講演是陳佩瑩小姐負責一切，籌備工作前後進行幾近一年，會前會後的許多細節和活動，都是她一手包辦。這次講演一切進行順利，陳小姐居功至大。在港期間，得到大學各同仁熱心的招待，實在感激。特別是新亞書院的黃乃正教授、朱嘉濠教授、陳新安教授，中文系的何志華教授、鄧思穎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主持講演、設宴款待，再三多謝。演講後，得到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經理黃麗芬女士、和編輯葉敏磊女士、余敏聰先生全力策劃出版事宜，萬分感激。第一講承黃俊濤先生按當日演講發言謄寫全稿，以便修訂，而三講全文蒙彭佩玲小姐細心校正，費心勞神，在此一併多謝。我特別要借這個機會向陳志新先生表示感謝。這許多年來，陳先生大力支持新亞書院的活動。因為他的慷慨情懷，新亞才能每年如期舉行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讓各地學者有機會來到新亞進行學術交流，秉承新亞精神，十萬里、五千載，共同結隊前行，向著不同研究領域共同邁進。

我研究粵語，但粵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原籍江蘇鎮江，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我能說粵語，但總有外鄉人的腔調，但是在新亞上學的時候，同班同學常常糾正我的發音。我能說國語，

其實也是在新亞接受的訓練。當年我們必得修讀國語，老師是王兆麟先生。他是北京人，教我們說國語，一個字一個字的調教、一個一個聲音的改正。有人說我是雙聲帶，其實都是從新亞開始。總其言，我的一切從十七歲到今年七十歲都是新亞給我的機會，讓我成長。十七歲的我是充滿好奇的小伙子，七十歲的我是一個衷心感到滿足的老人。不過，我還是充滿童真的好奇心，對什麼都會感到興趣，只是有時候會感到力不從心。我家住在加州三藩市附近一個小城，叫小山城。後院向東，前門朝西。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雲起雲落的景象。我知道，我在院子裡一坐，坐看雲起時，就會想到遠隔重洋的雲起軒、雲起軒裡的大碗牛肉麵、雲起軒中的諸位好友。

張洪年序於小山城

2016年深冬